

全面抗战时期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述论

洪小夏¹

(1.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2.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七十余年来的湖北抗战史研究, 重点在于湖北中共敌后战场及湖北国民党正面战场, 而极少有人研究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实际上, 国民党的湖北敌后战场, 理论认识于南京失守之时, 具体发轫于徐州会战期间第五战区在皖北的敌后游击战, 初步实践于武汉会战期间, 周密部署于武汉失守前后, 完整贯穿于武汉沦陷之后 7 年的湖北抗战全过程。这一战场地域广大, 兵力雄厚, 其主体部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是湖北抗日战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抗日战争 国民党敌后战场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

【中图分类号】: K26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21) 08-0098-12

一、绪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 学术界对湖北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前三十余年, 集中研究湖北的中共敌后战场, 重点研究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根据地, 并研究中共在湖北的其他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二是后三十余年, 增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即湖北国民党正面战场, 重点围绕发生在湖北的一些重大战役展开研究, 例如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等等。¹但对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研究则极其薄弱。全国各地抗战史的研究现状, 都与湖北大同小异。本文填空补缺, 专门研究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为促进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向更为全面、客观、科学、深入的方向发展而尽一份绵薄之力。

湖北的国民党敌后战场, 理论认识于南京失守之时, 具体发轫于徐州会战期间第五战区在皖北的敌后游击战, 初步实践于武汉会战期间, 周密部署于武汉失守前后, 完整贯穿于武汉沦陷之后 7 年的湖北抗战全过程。本文除绪论之外的主体部分, 根据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发展的脉络, 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追溯武汉会战之前国民党对敌后游击作战的认识、部署与初步实践, 上溯到七七事变之前; 第二部分概述武汉会战期间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部署与实践; 第三部分阐述武汉失守前后国民党对湖北敌后战场的部署; 第四部分概述武汉沦陷后长达七年时间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简况; 第五部分为代结语, 进行理论分析, 总结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特点, 评价其地位和作用, 分析其与中共湖北敌后战场的关系。

国民党敌后战场, 分布于深远敌后和浅敌后两类区域。“深远敌后”即四面被敌人包围、完全被隔断与大后方联系的沦陷区域, 又称作“完全敌后”。“浅敌后”是离正面战场较近, 两面或三面被敌包围, 但与正面战场尚保留一定联络通道的敌后区域, 又称作“半敌后”;²此外, 在正面战场上, 与中方战线相对的敌方一侧数十公里的纵深地带, 也属于浅敌后的范畴。深远敌后和浅敌后均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产生并变化。例如,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 1938 年 10 月武汉、信阳沦陷后, 成为

作者简介: 洪小夏 (1954-), 女, 历史学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三面被敌包围的“浅敌后”；1944年豫中会战结束、平汉线被彻底切断、沿线城镇全部沦陷后，该地区就变成四面被敌包围的“深远敌后”了。

国民党的敌后游击作战，在浅敌后，主要由正规军承担，由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守军编成各种临时性的突击队、便衣队、搜索队、出击队，向当面对敌的后方主动进攻，称作“出击战”，其实质是由正规军在浅敌后执行的特殊游击战。其目的，一是在正面作战时，出击敌后，或破坏其交通、通讯、后勤补给，以起辅助配合作用；二是在正面休战时，主动出击，消耗、迟滞、牵制敌军的进攻，以掩护主力休整。总体是以攻为守的防御战术，属于战术游击战的范畴。在深远敌后，国民党经常预留或派遣大量的正规军作为游击战的骨干，并领导和指挥各种非正规军的游击队，开展相对独立的敌后游击战争，属于战略游击战的范畴。

全面抗战前期领导湖北抗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是坚定的主战派，对游击战术又非常重视，长期有计划地派遣和指导大批正规军和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

二、武汉会战之前国民党对敌后游击作战的认识、部署与实践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就预判将来日本准备好之后，一定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在未来的中国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术”将是中国抗战的五大重要战术之一。³后来成为湖北战场指挥者的桂系首脑李宗仁，也很重视游击战。他早在1936年12月应上海《东方杂志》之约发表论文时就主张：

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在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抗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城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苦之；交通、资源、经济等，长拖下去，日本必败。^{[1] (p19)}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华东、中原等地的节节失守，抗日游击战被沦陷区的中国民众广泛实践，其作用也日益受到中国军事将领和政治领袖们的重视。

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沦陷当天，军事委员会便在武汉拟制了新的《第三期作战计划》。⁴该期作战的方针为：“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重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指导要领为：“1. 划定各战区范围，并选定根据地，……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2. ……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2] (p634-635)}

此后不久，⁵军事委员会另拟了一份《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统帅部指导方案》的文稿，预判日军完成目前作战、打通津浦铁路之后，将有可能“侵袭郑州及武汉”，提出：“我应未雨绸缪，预为适切之筹划，……由湘赣之幕阜山脉至豫皖鄂境内之大别山脉，尤以在大别山脉之东、北两正面应预为布置，盖该方面预想为将来之主战场也。”^{[3] (p646, 648)}依笔者所见史料，该方案初次赋予第五战区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和第九战区建立湘鄂赣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后来的实践证明，该方案对日军作战方向的预判非常准确，该部署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京沦陷后，为了更好地保卫武汉，军委会调整第三、五战区的边界，压缩第三战区、扩大第五战区的作战地境。以长江中下游为界，江南由第三战区负责，江北由第五战区负责，江北原第三战区的部队就地划归第五战区序列。^{[4] (p4)}12月20日，军委会进一步指示第五战区：应在鲁南沂蒙山区和豫皖边大别山区创建两个根据地，“于广大地域行游击战”。^{[4] (p13)}

根据军委会12月20日的指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时修改了战区第二号作战命令，于12月24日发布第五战区第二号作战命令之修正计划，将第五战区地境划分为4个作战分区：其中山东为第一分区，应“于泰安、鲁南间山地构成根据地，

以为本战区北战场挽回战局之枢轴”；苏北为第二分区，应在运河南段利用湖沼开展游击战；皖北为第三分区，应“于固始、立煌、经扶间山地构成根据地，以为战区南战场挽回战局之枢轴”。……第一、二、三分区均应遵照军委会 12 月 20 日指示，“与所在地政府及党部协力组织民众，发挥游击战，虽受敌压迫，亦不得退出分区境界”。^{[4] (p13-14)}

1938 年 1 月中旬之初，蒋介石到开封前线对第五战区军官训话，阐述武汉会战的部署为：“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为目的，以一部固守武汉，以主力分别集结于鲁西、徐蚌与鄂东南及湘东北地区，与各线、区游击配合，期对深入腹地之敌，一举歼灭之。”^{[4] (p16)} 1 月 20 日，军委会要求各部队加强对官兵的游击战教育与训练：“为适应游击战法，对于今后之部队教育，应自士兵起，以连、排、连、营各小队单位，求其独立作战能力之增加，尤应注意研究散开、集合、警戒、侦察及简单之通信方法。”1 月底，军委会下达命令：“在敌尚未有行动期间，各战区务以各种积极手段，采取攻势游击，使敌穷于应付。”⁶

为迎击日军对津浦铁路的大举进攻，李宗仁于 2 月 3 日发布第五战区第三号作战命令。将第五战区所辖部队划分为 5 个野战兵团；同时，将该战区“按战区形势划分为四个游击区域”：第一游击区，包括淮安及其以南地区，负责“向津浦、陇海各线及江海岸之敌游击”，并守备苏北沿海一线；第二游击区，以鲁南山地为根据地，负责“向津浦、胶济、陇海及鲁东南海岸之敌游击”；第三游击区，“位于鲁西地区，向津浦、陇海之敌游击”；第四游击区，位于皖北，负责截断津浦路南段，阻止敌之增援。⁷很明显，李宗仁决心采用游击战术来迟滞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的步伐。

在徐州会战的进程中，桂系第 31 军在皖北沿津浦线的游击战确实运用得很有成效。5 月中旬在徐州会战第四阶段第五战区部队大撤退之时，李宗仁将皖北沦陷区沿津浦铁路细分为 6 个游击区，分别派遣正规军（包括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部），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组训民众，破坏交通，截击日军的补给，迟滞日军西进的步伐，掩护第五战区主力成功撤退。^{[5] (p7-8)}徐州会战期间，第五战区在皖北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为后来武汉会战期间更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

三、武汉会战期间湖北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部署与实践

武汉会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以及游击战术的广泛运用，均比较自觉和纯熟。

1938 年 5 月 30 日，军委会对第五、第一战区发布武汉会战作战指导，其中对第五战区游击战的部署为：苏北“第 24 集团军以淮阴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 46 军以沐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5] (p13)} 6 月 2 日，军委会进一步对第一、三、五战区发布作战指导，其中对第五战区及军委直属部队的相关部署是：“第五战区逐次抵抗后，淮北兵团集结商城附近，准备侧击向西南突进之敌。淮南兵团徐源泉部第二十六集团军集结六安、舒城、霍山、桐城，阻止西进之敌。杨森部第 27 集团军固守安庆、无为、庐江，妨害敌军登陆；不得已时，退守潜山、太湖、宿松，准备侧击沿江西进之敌；无论状况如何变化，须保豫南根据地。但韩德勤之第八十九军、缪徽流之第五十七军，仍保苏北，向津浦南段游击。”军委会直辖的“豫鄂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所部，在随、枣、襄、樊、南阳间地区集结，准备侧击沿平汉路南段之敌，协力武汉卫戍部作战”；刘汝明部第 68 军、罗奇第 95 师，在鄂豫皖边敌后游击，“继续迟滞敌人”，尔后刘汝明部归第五战区序列。^{[5] (p19-20)} 这样的部署，高度重视正规军采用游击战术（例如韩德勤、缪徽流、刘汝明各军和汤恩伯、罗奇部均开展游击战）；即便是正面作战的部队，也注重采用侧击等运动战的战术（例如对淮北兵团的指示）；对阵地防守的部队，也指示守不住时可后撤，保持侧击的有利态势，亦可依托山地，机动转为游击作战（例如对杨森第 27 集团军的指示）。

第五战区 5 月 30 日制定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关于游击战的部署，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苏北第 24 集团军、第 46 军“应常向津浦南段或陇海东段地区之敌扰乱侧击，以牵制敌向西及西南进犯”。如“我主力反攻时，应向西扩大游击。……并发动民众武力，配合向西反攻，以资声援”。如“被敌压迫时，应分散于洪泽、高邮、宝应及其以东港湾分歧之地域，以为再起之根据”。二是正面防守部队应以攻为守，瓦解、至少延缓敌人的进攻，“以一部在前进阵地之前方，配合地方武力机动挺进游击，极力迟滞敌人之前进”。三是如果最后守不住、战区正面主力西撤时，“应逐次留置小部队，配合地方武力担任游击，以牵制敌之西进”。^{[5] (p14-18)}

武汉会战打响后，进攻武汉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因6月黄河决堤造成淮河流域泛滥、陇海铁路中断的情况，被迫改变了原定沿陇海铁路西进占领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南下攻取武汉的计划，改为溯长江西进，夹江南北并行，在海军舰艇及陆战队配合下作战的新部署。中国相应调整作战部署，军委会将参战部队整编为4个兵团，第一、二兵团在江南，由第九战区（初为武汉卫戍区，6月又成立第九战区，武汉卫戍司令陈诚兼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第三、四兵团在江北，由第五战区指挥。

进攻江南的日军，于1938年7月25日攻占九江之后，兵分三路，分向南、西方向进攻德安、庐山和瑞昌。军事委员会于7月26日电令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薛岳，转令第25军组织游击队，牵制进攻庐山的一路敌军。薛岳命第25军执行。第25军（军长王敬久）命第52师和第190师，先后组织游击连、游击营和游击团，并指挥庐山区游击总指挥胡家位和江西省游击副总指挥杨遇春所辖保安队两个团，携带迫击炮等，分路袭击敌人。庐山游击区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坚持敌后游击战，发挥了相当的牵制作用，使日军迟迟不能攻占南昌。^{[6] (p883-886)}

武汉会战中期，军委会在9月16日发布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进一步指示：“第五战区以大别山、大洪山为作战根据地，以麻城、黄安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之作战”。“第九战区以幕阜山、九宫山为运动战根据地，以武宁、永修、通山、咸宁为据点，以策应武汉核心作战。”^{[3] (p657)}

在长江以北，从9月中旬至11月下旬，第五战区第5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亲率第51军附第21集团军之138师合计3个师兵力，在平汉铁路东边的大别山地区，阻击、侧击、扰击穿越大别山地区的日军第13师团以及第3、第10、第16师团各一部，迟滞日军行动，破坏日军运输，成效显著。第51军代军长牟中珩（军长于学忠兼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划分所辖第113、114两个师的游击区域，命各师组织游击队，分头出击，多有斩获。例如，10月3日夜，第113师673团第2营，在姚岭伏击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的炮兵输送队，击毁敌汽车10余辆，毙伤敌掩护部队200余人，毙伤敌马数十匹，缴获敌马5匹。10月中旬，第51军主力奉令向六安、商城间进攻，一度攻占富金山、段家集、何家楼等地的日军据点，切断叶家集至商城公路，破坏桥梁、电线、公路多处。10月下旬，第114师679团奉令协同固始自卫队，向固始北边三河尖方向出击，袭击日军淮河运输船队；第113师主力在叶（家集）商（城）公路南北两侧游击，两师配合，截断日军陆地叶商公路和水上淮河运输，有效策应了正面作战。^{[6] (p887-893)}

军委会还多次电令第五、九战区之外的其他各战区，发动游击战争，牵制当面日军，以策应武汉会战。例如，8月1日，蒋介石指示各战区“希转令所属积极游击，务使我武汉作战有利”。^{[7] (p60)}8月15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各战区：“综合近来情报，日军确已抽调各方兵力，沿江进窥武汉”；“各战区除以正规作战部队，采取攻势，牵制敌兵外，并应积极游击，遮断敌之水陆交通，毁敌之辎重，以优势兵力击灭敌小部队，分散敌之兵力，使保卫武汉之作战容易。”^{[7] (p62)}9月中旬，蒋介石又指示各战区“所属各部队，一齐发动，在敌后方破坏交通，截敌辎重，断敌补给，并不断袭击敌人；如敌向我进犯，须坚强抵抗，多方牵制，以策应第五、第九两战区之作战，摧毁其占领武汉迷梦”。“敌东西抽调，已极疲劳，宜用游击战法，以增加其疲劳程度；小部之敌则歼灭之，大部之敌则扰袭之，行则截击，驻则扰乱，使敌益陷于困乏；到处牵制，到处打击，使敌原订计划无法实施，有隙乘机突击，必奏奇效。”^{[7] (p66)}

武汉会战期间，第三战区在京沪、沪杭和长江沿线游击，并派江防炮兵袭击长江日军军舰和运输船舶；第一战区在山东、豫北、豫东开展敌后游击战；第二战区在晋南发动敌后攻势作战，都对武汉会战起到了重大的配合、牵制作用。

正是由于军委会“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3] (p648)}利用武汉外围的山地丘陵、江河湖泊等天然地障，逐次消耗日军进攻的战略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运用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机动灵活的战术指导，使得武汉会战坚持达5个月之久，取得毙伤敌军十余万（包括取得万家岭大捷的局部胜利）的可贵战绩。这跟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那种死战不退，造成巨大伤亡，最后人、地皆失的呆板阵地防守战术相比，应该说有巨大的进步。游击战术的有效运用，是武汉会战的重要特点和亮点之一。

四、武汉沦陷前后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部署

早在武汉会战之初的1938年6月8日，军令部在制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时，就曾预先做出武汉沦陷之“尔后游击部署”，明确要求：“第五战区……应指定八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苏北兵团，应以有力部队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第九战区尔后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川向敌后方游击。”^{[8] (p308-310)}此时苏北兵团第24集团军辖第89、57两个军共4个师，加樊崧甫第46军3个师，合计7个师；前已述及，大别山尚有8个师，九宫山尚有4个师。即军委会设想，武汉沦陷后，第五、第九战区应在大别山（豫鄂皖）、苏北（豫皖苏）、鄂南（湘鄂赣）三个方向共部署至少19个师⁸以上的正规军，用于湖北以及与豫、皖、苏、湘、赣等省相邻地区的敌后游击作战。

武汉沦陷前夕，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于10月中下旬对武汉失守后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作了周密、具体的部署。

先是军令部奉蒋介石手令，指示第五战区：原中央兵团廖磊部改组为苏皖鄂兵团，辖4个集团军，“留置商麻公路以东大别地区任敌后游击战”；其他各兵团向西转移。但主力“各部转移之前，必须留置掩护及前方游击部队，非有命令，不得撤退，并常需与敌保持接触，以资牵制”。^{[6] (p852-853)}

随后第五战区于10月17日在武汉东北的麻城宋埠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根据军委会的指示，策定了“三步走”的三期撤退计划。其中前两期是对主力部队交替掩护、逐次西移的安排；第三期则是对武汉沦陷后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部署：战区将主力逐次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原“中央兵团各部，应在商麻公路以东之大别山山地游击，尔后兼指挥在苏、皖边区游击之第二十四集团军，改为苏皖鄂边区兵团”，^{[6] (p855)}辖第21、5、26、24共4个集团军，“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山脉游击，以牵制敌之西进”。^{[6] (p853)}

麻城宋埠会议后，第一期撤退计划即开始执行，第五战区各部按照计划，交替掩护，逐步西移。10月24日，开始执行第二期撤退计划。10月26日，中央兵团司令廖磊公布了10月17日第五战区制定的第三期撤退计划的内容：“将主力向铁路以西转移，确保鄂西；一部留置苏皖边区及大别山区，续行游击。”原中央兵团总司令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统一指挥第21、第5、第26三个集团军，其中原中央兵团在平汉铁路以东向商（城）麻（城）公路以东游击，第26集团军之第10军向商麻公路以西游击，掩护主力西撤。^{[6] (p893)}廖磊还于10月29日半夜12点补充命令：第5集团军担任原中央兵团西撤之掩护任务，所辖“各部队应挑选官兵编组一排（或一连）为一队之轻装游击队，分多路向敌侧背游击”；地方游击队汪宪及顾莹所部，归第5集团军指挥，“担任邓家集、……新店等地区之游击”。^{[6] (p894)}

第5集团军第51军10月30日晚命令下属“各部……应另选官兵组成一排和一连为一队之便衣轻装游击队，分多路绕至敌之侧后方施行游击”。^{[6] (p894)}第51军便衣游击队，在掩护主力撤退的过程中，多次袭击日军：切断叶（家集）六（安）公路，并时常袭扰叶商（城）公路和固（始）叶公路，迫使日军向商城收缩；11月上旬，还在淮河南岸先后击沉日艇10余艘，伤毙日军100余人。^{[6] (p894-895)}

武汉沦陷后，按照军委会和第五战区的原定计划，第五战区原中央兵团应改名为苏皖鄂边区兵团，原中央兵团总司令廖磊兼任苏皖鄂边区兵团总司令，指挥第5（总司令于学忠，东北军，辖第51军2个师）、第21（总司令廖磊（兼），桂军，辖桂系精锐部队第7、48军共4个师）、第26（总司令徐源泉，辖第10军2个师及第199师共3个师，早年是鲁军张宗昌部，北伐时转投中央军）、第24（总司令韩德勤，辖89、57军共4个师，其中第89军是由江苏省地方保安团升级编成的中央军，第57军是东北军）共计4个集团军，分别在大别山区和苏皖边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但第26集团军后来很快离开大别山，第24集团军一直在苏北，实际在大别山的只有第21和第5两个集团军。廖磊便调整了计划，于11月正式组建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廖磊兼任该边区游击总司令，率领第5和第21集团军，建立大别山敌后根据地。⁹

豫鄂皖边区范围为平汉线以东，津浦线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以大别山为中心，以豫鄂皖三省边界22个县城尚未沦陷的县为核心，包含另20个县城已沦陷的各县大部或一部，合计42个县的范围，占第五战区辖区面积的40%。^{10[9] (p30)}边区北据

淮河，南扼长江，向西可威逼平汉铁路，向东可控制津浦和淮南铁路，对武汉、九江、安庆、芜湖乃至南京等沿江敌占重要城市形成威胁。故廖磊认为：“大敌当前，非保卫江淮，无以屏蔽陇蜀、恢复中原；非巩固大别山脉，无以树立大举反攻之基。”^[10]

1938年11月16日，廖磊发布大别山根据地作战计划，方针是：“以扩大战果、消耗敌军战力，策应友军作战，达成持久抗战之目的，确保皖鄂豫边区，以大别山脉为根据，而行广泛积极之游击，随时随地不断妨害扰袭敌人，相机捕捉敌之一部而歼灭之。”廖磊划分大别山根据地为核心区和外围地区：以金寨（立煌）、霍山、岳西、英山、麻城、新县之间的大别山腹地为核心区；以核心区外的桐城、潜山、太湖、宿松、黄梅、广济、浠水、宣化店等为外围地区，并将环形的外围地区划为4个分区，由第5和第21集团军以及各游击部队划区分兵把守。例如，第5集团军并指挥地方游击队负责“第一分区之守备及游击”。除在外围地区各要口配备必要部队之外，“另以一部分向商麻路北段及六商路择段游击，扫荡残敌，逐次扩大范围”。^{[6] (p895-897)} 11月20日，第5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又划分该集团军活动范围为4个游击区域：第51军一部担任叶商公路以北、方家集至固始一线以东地区游击；第三游击支队、第十一游击支队、豫鄂皖边区游击队分别担任另外三区之游击。11月下旬，日军收缩。第51军和豫鄂皖边区地方游击队立即收复了商城、潢川、六安等重镇。^{[6] (p897)}

五、武汉沦陷后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在将近七年时间里，国民党在湖北全省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游击战。湖北的国民党敌后战场，在长江以北主要有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根据地和江汉平原游击根据地等，隶属于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南主要有第九战区的湘鄂赣边区敌后游击根据地。1944年底，军委会撤销了第五战区的豫鄂皖边区总司令部和第一战区的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部，合并组建了新的第十战区。

因这一阶段时间较长，部队众多，头绪纷繁，下面分为长江以北的第五战区、长江以南的第九战区、后期的新第十战区三个部分简述之。

（一）第五战区湖北敌后战场概况。

湖北省境内的国民党敌后战场，在长江以北主要有：桂系廖磊（后李品仙）第21集团军开辟的大别山根据地，川军王缙绪第29集团军开辟的大洪山根据地，中央军汤恩伯第31集团军开辟的桐柏山根据地，以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王劲哉第128师开辟的江汉平原游击根据地。这4块根据地，都在鄂东鄂中地区，隶属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江汉平原根据地中心区沔阳在汉江以南，属于后来成立的第六战区的范围，但划归第五战区领导）。其中大别山在平汉铁路之东，大洪山和桐柏山在平汉铁路之西，按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说法：“这一时期，我五战区的战略是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发挥机动战与游击战的最高效能。”^{[11] (p558-559)}

武汉会战末期就已开辟的大别山根据地，在1939年春第5集团军调往鲁苏战区后，由第21集团军（廖磊）单独经营。1939年5月，第五战区在随枣会战日军占领钟祥、随县后，留置第11集团军（李品仙）所辖的第39军（刘和鼎）于大洪山，命其建设游击根据地。^{[12] (p40-45)}

第五战区于1940年初冬季攻势结束后，对辖区内的战场态势做了调整，围绕正面战场设立了4个游击区，由北至南分别为：位于豫南平汉线东西两侧，以信阳为中心的左集团军游击区；位于鄂北平汉线广水至花园段以西的中央集团游击区；位于平汉线花园至孝感段以西，包含汉江以东安陆、应城、京山、钟祥的右集团游击区；位于平汉线孝感至汉口段，包含江汉平原天门、潜江、沙洋等地的江防军游击区。^{[13] (p7 后插图二)}这四个游击区，后三块分别以桐柏山、大洪山、江汉平原游击根据地为核心，第一块与平汉路东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相连。

鄂东北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如前所述在 1939 年春以后由第 21 集团军经营，指挥官在廖磊于 1939 年 10 月积劳病逝后由李品仙接任。该地区在 1938 年底武汉、信阳失守后成为半敌后的根据地；1944 年春豫南会战以后成为完全敌后的根据地。

豫鄂边的桐柏山游击根据地由军委会直属机动兵团中央军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开辟和建设。在 1938 年底信阳、武汉失守后，尤其是 1940 年宜昌失守后，具有位于正面战场侧后的战略地位；在 1944 年春豫南会战平汉线失守后，成为半敌后的游击根据地；1945 年春豫西鄂北会战后，成为完全敌后的根据地。

鄂中的大洪山游击根据地初由桂系第 39 军开辟，后由右集团川军王缙绪第 29 集团军经营。该地在 1939 年春钟祥、随县分别沦陷后，尤其是 1940 年 6 月宜昌失守后，成为半敌后的游击根据地；1945 年春豫西鄂北会战后，成为完全敌后的游击根据地。

以沔阳为中心，包括天门、监利、潜江等县部分地区的江汉平原游击根据地，由先属于第九战区，后改隶第五战区江防军所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 128 师王劲哉部等于 1938 年底开辟，武汉失守后即处于敌人侧后的战略地位；1939 年春夏随枣会战钟祥、监利失守后，成为严格意义的半敌后游击根据地；1943 年春鄂西会战之初，成为日军的首要进攻目标，128 师部队被打垮，该地成为完全敌后。这块根据地至鄂西会战时坚持约 5 年时间，后由 128 师残部和新四军恢复和重建了部分游击根据地。

位于各敌后游击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担任敌后侧击、游击的作战任务。在 1939 年 5 月随枣会战、1939 年底至 1940 年初冬季攻势、1940 年 5 至 6 月枣宜会战、1941 年 1 至 2 月豫南会战、1943 年 2 至 6 月鄂西会战、1943 年秋冬常德会战、1944 年春豫中会战、1945 年春夏豫西鄂北会战等发生在湖北或与湖北相邻地区的诸次正面战场的会战，以及各游击根据地的历次反扫荡作战中，均发挥了相当的战略作用。

例如，枣宜会战时，第五战区在 4 月 13 至 14 日开会研讨后制定的作战计划中确定的方针为：“战区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扰袭；主力适宜控制于后方，相机以先发制敌行动……与敌决战。”指导要领为：“以各集团之长期破坏队，及各军编组之各种出击队，遵照三月三十日军事委员会对出击队编组、分区及游击实施办法，依划分之区域挺进扰袭。”如日军沿襄花路西进或沿平汉线北进，左集团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将依托桐柏山根据地，右集团张自忠第 33 集团军和王缙绪第 29 集团军将依托大洪山根据地，对日军进行侧击；而大别山的李品仙第 21 集团军则向平汉线西进，威胁敌之后方。^{[13] (p12-14)}为“发挥游击军协同正规军作战以争取作战胜利计”，该战区还先后拟制了《豫鄂皖边区游击军协同正规军作战计划》^{[13] (p16-17)}《第五战区调整各集团军游击地区计划》^{[13] (p193-194)}等专项计划。在枣宜会战过程中，第五战区正面作战的各集团军在自己的游击区域内经常向日军展开出击战；位于敌后的豫鄂皖边区第 21 集团军全力向平汉路沿线出击和游击；该战区的各游击纵队也发挥了重要的牵制、策应作用。

1942 年 12 月 18 日，日本第 11 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后被追赠为大将）乘坐的运输机在从南京飞回汉口的途中，于大别山南麓被豫鄂皖边区第 21 集团军第 48 军第 138 师部队击落，机上 11 人全部毙命。冢田是抗战时期被中国敌后部队击毙的最高职务陆军军官。为此，日军调集 4 个师团的兵力，报复性扫荡豫鄂皖边区，在 1943 年元旦一度攻占大别山根据地核心、豫鄂皖边区总司令部所在地立煌县（后撤出），^{[14] (p205-206)}可见敌军对该根据地具有很深的敌意。

（二）第九战区鄂南敌后战场概况。

在湖北省境内，除了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北的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江汉平原等敌后根据地或游击区之外，还有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的湘鄂赣边区敌后游击根据地。

早在武汉会战期间，为了在平汉线以东牵制西进的日军，军委会于 1938 年 7 月在汉口成立了豫鄂湘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任命孔荷宠为总指挥，预设编制为 3 个直辖团级支队，官兵共 3000 余人，先在汉口开展训练。^[15]这可视为设立湘鄂赣游击区的滥觞。同年 6 至 11 月，安庆、九江、武汉、岳阳相继沦陷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成为沦陷区和第九战区的前哨阵地。此

地横跨湘、鄂、赣三省边区：洞庭、鄱阳两湖屏障东西；粤汉、南浔铁路纵贯南北；庐山、岷山、幕阜山（含九宫山），自西而东，斜列鄂赣边界；九岭山、武功山蜿蜒于幕阜山之南；^{[16] (p6-6)} 山林茂密，适宜建立游击根据地。军委会在武汉失守之前就曾指示：“第九战区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根据地，取积极行动，夹击围攻武汉之敌，同时截断敌后方之联络线。”^{[3] (p659)} 并具体指示第九战区“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川向敌后方游击”。^{[3] (p662)} 第九战区遂于同年底在靠近湘鄂赣边界的江西修水设立了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以原第46军军长樊崧甫为总指挥，下辖第8军、73军共4个师正规部队和若干游击部队（例如湘鄂赣边区游击司令孔荷宠，驻鄂南通城崇阳一带，辖3个游击支队）。¹¹ 该指挥部首先在鄂南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随后在赣北庐山建立游击区；江西地方保安团还在庐山之西的岷山建立了游击区。¹² 1939年3月南昌会战期间，第九战区在湘鄂赣边区建立了5个游击区：第一区含鄂南鄂赣边的鄂城、大冶、阳新、武宁等县；第二区含鄂南粤汉沿线的武昌、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山等县；第三区含湘北粤汉沿线的临湘、岳阳、湘阴等县；第四区含赣西北修水、铜鼓等县；第五区含湘东北湘鄂边的通城、平江、浏阳等县。¹³ 在南昌会战中，各游击区游击部队均发挥了一定的牵制作用。5月，军委会再次指示第九战区在湘鄂赣边区广泛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17] (p165-167)}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前，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主要有6个游击区，其中与湖北相关的有3个：第三游击区，位于鄂南鄂赣边大冶、阳新、瑞昌一带；第四游击区，位于鄂南粤汉沿线咸宁、蒲圻以及通山、崇阳一带；第五游击区，位于湘鄂边粤汉沿线崇阳、岳阳、临湘之间。¹⁴

1940年4月，第九战区制定了详细的《湘鄂赣边区工作计划》，决定为“威胁敌伪盘踞之战略要地，与牵涉其大兵团之运用，并造成将来战略上反攻的基础，于湘鄂赣边区建立坚良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以利全面抗战”。其任务是“随时以有力之部队，向东截断南浔路，控制鄱阳湖，袭击南昌、九江；西北截断粤汉路北段，威胁武汉，巩固长沙，以使其他战区作战容易”。要求“选定优越地域，建立主、支游击根据地，以发动深广、强劲、活跃之游击战，而策应正规战之战胜攻取。”具体来说，“选定幕阜山主、支各系山脉绵延地域，建立主、副、预备等游击根据地”，“确保赣西、湘北，形成战略上反攻之基础”。^{[18] (p20-50)} 此时的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游击区范围包括：“永修、武宁、平江、湘阴各县（含）以北，鄱阳湖（不含）以西，洞庭湖（不含）以东，长江（不含）以南地区”，以幕阜山为中心，包含九宫山、庐山、岷山等山岳地带。该边区设游击总指挥部，在边区内再划分若干小的游击区；每区设一名游击指挥官，指挥在该区内活动的各游击队。^{[19] (p7)} 各游击区与上文所述1939年9月的分区情况大致相同。

在1939年春南昌会战、1941年秋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冬第三次长沙会战、1944年夏长衡会战等诸次战役中，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正规军和游击队主动出击，积极配合，发挥了一定的战略牵制作用。

（三）第十战区的设立和抗战后期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概况。

1944年春夏之交的豫中会战后，河南境内的平汉线被日军打通，第五战区位于平汉线以东的豫鄂皖边区与平汉线以西的战区司令长官部之间的陆路联系被切断。又鉴于鲁苏战区1943年就名存实亡，1944年5月明令撤销；冀察战区也早就名不符实；第一战区鲁苏豫皖边区又随1944年秋汤恩伯的南调而名存实亡，国民党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在抗战后期受到很大削弱。军事委员会便于1944年12月28日做出决定：撤销原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以该地为中心，将平汉路以东第一与第五两战区原辖区域合并，设立第十战区。¹⁵ 1945年1月1日下达委任状和作战序列，1月12日正式成立司令长官部，所辖部队初为第21（李品仙）和第15（何柱国）两个集团军，原鲁苏战区撤往皖北的第51军，以及各游击部队；1月23日又增辖第19集团军（陈大庆）；合计3个集团军，以及山东、苏北、豫东、鄂东各地的游击部队。原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鄂皖边区总司令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升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仍兼任第21集团军总司令）；第15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山东挺进军总指挥牟中珩、江苏挺进军总指挥兼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苏北特别行政主任兼长江下游挺进军总指挥李明扬四人升任副司令长官。¹⁶ 司令长官部仍在李品仙的豫鄂皖边区安徽立煌（金寨）县，另在豫皖苏边区安徽临泉设指挥所，统一指挥以大别山和黄泛区为中心的中原广大敌后地区的游击战，直到抗战胜利。¹⁷

第十战区辖区为“平汉线以东，[老]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包括原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第一战区鲁苏豫皖边区和原鲁苏战区全部，面积约占关内全部沦陷区的三分之一，超过调整后的第一、第五两个战区总面积之和。该战区南拊第三、九战区，

北衔冀察战区，^[18]西屏第一、五战区，在地理上位于中国沦陷区的中部，并紧邻沦陷区的日伪政治中心宁沪杭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它是继鲁苏和冀察战区之后成立的辖区全部在敌后的游击战区，其所辖正规军多达3个集团军7个军16个师零2个旅，约20万人，还有大量的游击部队（游击部队中包含不少师、旅建制）。该战区的设立是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力图振兴敌后战场的重要标志，也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抗战后期仍有所发展的表现之一。

在1945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豫西鄂北会战中，作为主战场的第五和第一战区，正规军和游击部队协同作战，在会战中多次采用侧击日军和袭击日军敌后交通的游击战术。^{[20] (p39-78)}但该次会战的结果，仍是豫西、鄂北大片沦陷，大洪山、桐柏山也成为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完全敌后。第五战区新任司令长官刘峙在会战结束时的5月5日，做出依托大洪山、桐柏山等根据地继续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部署：“第六十九军（附第三、第六、第九挺进纵队）归本部直接指挥，以大洪山为根据地，任平汉路以西，襄河以北、以东，朱家集、枣阳、随县、应山、广水以南，对敌各据点及交通线之攻击。杜大忠所部第七挺进纵队及第五十五军之第七十四师，归本部直接指挥，以桐柏山为根据地，任邓县、南阳、方城、舞阳、漯河之线以南，平汉线以西，白河以东，朱家集、枣阳、随县、应山、广水之线以北，对敌各据点及交通线之攻击。”^{[20] (p95-96)}

豫西鄂北会战中，最耀眼的游击战发生在第十战区。3月22日，军委会先是拟定了《第六、第十战区策应第五战区作战指导要领》，又于同日和翌日连续致电第十战区，指示第十战区应派3至5个师兵力，分别在平汉线漯河、遂平间和信阳以南地区，对日军进行牵制性攻击。^{[20] (p124)}第十战区临泉指挥所主任何柱国，统一指挥泛东区的第19集团军、第15集团军及第51军各一部；另设立豫南挺进军指挥部，由张轸任总指挥，指挥第13、14、15、20共4个挺进纵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则直接指挥豫鄂皖地区的第21集团军第7军和第84军各一部，发动敌后策应游击战。^{[20] (p125-126)}第十战区策应豫西鄂北会战的游击战，合计正规军全程参战者有2个师另1个团，游击队6个纵队，短时参战者还有正规军4个师1个旅；共击毙日伪军500余人，击伤日伪军700余人，生俘日本军士1人、伪军14人，炸毁桥梁、火车，破坏铁路及通信设施多处，完全占领或一度攻入上蔡、汝南、正阳、遂平、泌阳等县城，另攻击小据点数十处，战绩显著。^{[20] (p123-132)}

六、全面抗战时期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特点及其评价

（一）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的特点。

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湖北敌后战场，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兵力雄厚，拥有以正规军为主的武装力量。以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九宫山、江汉平原等游击区、根据地为核心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承担游击任务的部队，拥有以正规军为主、以游击队为辅的武装力量结构。与第三战区敌后国民党游击队和正规军各占一半，以及海南岛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全部是游击队的结构，具有显著差异。湖北国民党敌后部队常年维持10余万的正规军（最多的年份达20余万）和数万至10余万的游击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拥有正规化的编制和装备；不仅能打游击战和运动战，也能打阵地守备战甚至攻坚战，从而能够有效地攻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例如，大别山根据地的核心安徽立煌（金寨）县城，尽管多次遭到日伪军进攻，但除了1943年元旦那天短暂失守之外，一直被国民党军队牢固防守。

第二，根据地、游击区地域广大，并重视根据地建设。从鄂北、鄂东、鄂中到鄂南，上述五块大根据地和其他小块的零散游击区，星罗棋布。据笔者估算，湖北国民党敌后游击区、根据地面积约占湖北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占湖北省沦陷区面积的70%以上，可谓地域广大。各根据地均很重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以大别山根据地的后勤建设为例：在武汉失守之前，国民党军队即开始抢运粮弹囤积于大别山，并抢修工事；武汉沦陷以后，又突击几个月，赶建营房、仓库，修筑路障、据点，修建通讯网和交通线等，使该根据地的物资储备和各类防守的工事据点，均比较充分和完备，^{[21] (p99-101)}为以后该根据地的长期坚守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再以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为例，豫鄂皖边区在立煌县创办政治学院1所（三年制，相当于大专），还规定“保办国民小学，乡（镇）办国民中心小学，县办初级中学，高中及高中以上之专科学校由省办理。国民基础教育，一律免费”。^{[14] (p196)}在大别山根据地和鄂东游击区，还分别创办有报纸、杂志、出版社、印刷厂若干，

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22] (p30)}

第三，持久作战，地位重要，作用显著。从武汉沦陷后开始，除第 128 师的沔阳根据地只坚持了 5 年以外，湖北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主体均坚持到抗战胜利；不像华北、华中其他地区的国民党敌后根据地那样中途夭折。前已述及在配合诸次正面战场的会战和各游击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中，各游击区、根据地均发挥了一定的战略作用。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长期发挥独立的战略作用。因此 1945 年初正式成立的第十战区，虽然完全位于敌后，但其指挥机关没有如 1939 年初设立的敌后游击战区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那样仅定为总司令级，而是和其他非完全敌后的战区一样设立司令长官部，反映了军事委员会也认可该战区的重要战略作用。抗战胜利后，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担任蚌埠地区受降官，是以敌后战场主官身份出任受降官的唯一将领。这既是坚持敌后抗战的广大国民党官兵的代表和荣耀，也是军委会对国民党敌后战场作用的认可。

（二）湖北国共两党敌后战场的关系。

第一，国民党湖北敌后战场具有抗日和反共的两重性。国共两党都在湖北开辟了敌后战场。双方的根据地 1939 年以后有时犬牙交错，¹⁹难免产生摩擦。毋庸讳言，国民党敌后部队既打日伪，又和共产党新四军闹摩擦；他们的驻防，既有防日伪的目的，也有防中共的目的。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敌后战场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具有两重性。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以正规军为主体，湖北共产党敌后战场开始没有正规军，人数也比较少，且湖北沦陷初期在敌后发展的空间很大，故国共双方的军队都力避冲突，各自向不同方向发展，所以在武汉会战之前、期间和武汉沦陷后初期，国共敌后部队尚无明显冲突，国民党敌后作战的两重性尚不明显。武汉沦陷后大约一年，国民党游击部队和新四军以及中共抗日游击队逐渐产生了矛盾和冲突。1939 年秋，曾发生过鄂东“夏家山事件”和豫南“竹沟事件”；1942 年 4 月以后，第五战区曾对鄂豫边的新四军发动过较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两重性是国民党敌后战场的基本特征；国共在敌后存在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二，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抗日的一面始终占主导地位。国民党敌后战场的两重性，尤其是其反共性的一面，是以往引起我们诟病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不应该否认他们在敌后有抗日的一面。湖北国民党的敌后战场，从总体来看，是以抗日的一面为主导的，具体表现在前述国民党敌后部队的多次抗日游击作战。从数量上看，他们与日伪军作战极多，跟新四军摩擦极少，否则就不能解释日伪军为什么会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第 128 师江汉平原等湖北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多次围剿与扫荡。

第三，湖北国共两党的敌后战场也具有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关系。湖北国共两党的敌后战场除有前述相互冲突、摩擦的关系之外，还有相互支援、配合的关系。在抗战初期国共尚无明显冲突矛盾的时候，国共两党敌后游击部队经常展开战役战斗层面的直接配合。在后期国共两党已发生摩擦后，仍具有战略配合的关系。例如 1939 年春随枣会战、1940 年春枣宜会战、1941 年初豫南会战中，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曾对第五战区部队主动出援，发挥了直接的战役配合作用。1943 年春鄂西会战中，新四军第五师也曾和第六战区部队进行战略配合。即便在日军扫荡时国共两党未做战役配合，但因为分别牵制着当面之敌，实际上减轻了对方的负担，在客观上仍发挥了一定的战略支持作用。在日伪军没有大规模作战行动时，国共两党的敌后根据地及敌后部队也同样具有唇亡齿寒的战略配合作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1] 李宗仁. 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1936 年 12 月）[A]. 周焕. 李宗仁将军言论：焦土抗战[C]. 汉口：一星书店，1938.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
- [4]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M].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 [5]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抗日战史·武汉会战：一[M].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 [6]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抗日战史·武汉会战：十[M].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 [7]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抗日战史·晋绥游击战：一[M].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 [8] 军令部. 保卫武汉作战计划（1938年6月8日）[A].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C].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 [9] 军令部签呈（1940年2月28日）[Z].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暨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史会）档案 787-3138.
- [10] 廖磊. 遗嘱（1939年10月23日）[N]. 中央日报，1939-10-29(1).
- [11] 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12] 第39军. 大洪山游击粉碎敌西进企图[A]. 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 随枣会战纪要[Z].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 787-3002.
- [13]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抗日战史·枣宜会战[M].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0.
- [14] 李品仙. 李品仙回忆录[M]. 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 [15] 孔荷宠. 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1938年7月21日）[Z].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档案 773-753.
- [16]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抗日战史·第一次长沙会战[M].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 [17] 乔茂材. 军令部第一厅十二科签呈（1939年5月29日）[Z].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 787-11955.
- [18] 湘鄂赣边区工作计划（1940年4月）[Z].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 787-11932.
- [19] 湘鄂赣三省边区游击队整理办法（1940年3月）[Z].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 787-11923.
- [20]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抗日战史·豫西鄂北会战[M].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 [21] 陈存恭. 徐启明先生访谈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
- [22] 丰潮. 大别山——精神粮食的生产工具[N]. 阵中日报（老河口：第五战区主办），1941-09-17(3)~1941-09-19(3).

注释：

1 研究新四军第五师及鄂豫边根据地的通史类代表作有 2 本：1.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年）；2.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研究湖北抗战史的通史类代表作有 3 本：1. 敖文蔚主编：《湖北抗日战争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2. 刘宗武：《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 3 卷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3. 田子渝、黄华文：《湖北通史·民国卷》（该书主编章开沅等，该卷抗战部分作者黄华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这 3 本代表作中，敖文蔚主编的书，对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问题有一定的关注。但对武汉会战前及会战期间的湖北国民党游击战部署和实践基本没有提及，对武汉沦陷后的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整体研究比较粗糙和简略，存在一些缺漏。其他研究武汉抗战和湖北抗战的论著，对湖北国民党敌后战场问题的研究水平均不及敖著，基本上是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相关研究论文和各类专题研究著作等，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暂不赘述。

2 笔者对深远敌后和浅敌后的划分，参考了毛泽东所说四面被敌包围和三面被敌包围两种类型。详见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 年 5 月），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24 页。

3 这五种战术是：攻势防御；步步为营；固守不退；注重游击；军民合一。前三种主要是正面作战的战术，而后两种主要用于敌后作战。参见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1934 年 7 月 20 日）。该演讲词 1938 年 2 月 5 日公开发表于《中央日报》（武汉）等国内大报。又见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年，第 325—326 页。

4 此处“第三期”，实指抗战第一期第三阶段，即 1938 年 6 月初至 11 月底（徐州会战后至武汉会战结束）。

5 这份文件是手稿，没有注明拟定时间。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编研者判定为“1938 年？月？日”。笔者认为更可能是 1937 年 12 月下旬。因为该文件建议在湖北成立一个预备战区，显然就是后来成立的武汉卫戍区。而武汉卫戍区是 1938 年 1 月成立的（参见何智霖编：《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 年，第 80 页；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632 页），所以这份文件的拟制时间应早于 1938 年 1 月。故笔者采用 12 月 13 日制定《第三期作战计划》“此后不久”的时间描述。

6 以上两条军委会命令，转引自王平编著：《抗战八年（上）》，原作 1966 年出版，收入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71 辑》（第 705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 年，第 92、93 页。

7 《第五战区第三号作战命令》（1938 年 2 月 3 日），见《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第 18 页。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641—642 页。两种史料内容一致，但详略和文字表述稍有差异。据笔者在二档馆看到的该命令电文稿原件，大意相同，但文字与该两文件又略有出入；且档案原件无标点符号，该两文件的标点符号，都是各书的编辑者自行断句的。笔者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文件内容，使用现代标点符号重新断句，增加了分号和句号等（上下同）。

8 蒋介石在审阅军令部计划时，将第五战区的“八个师”改为“十二个师”。即蒋介石希望武汉沦陷后，第五、第九战区能留置 23 个师以上正规军坚持湖北及相邻地区的敌后游击作战。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61 页。

9 各军来源，见刘凤翰：《抗战时期国军扩展与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4 年，第 67—71 页。廖磊兵团之序列，见《抗日战史·武汉会战（十）》，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正文第 883 页前之第四篇第 13 章第 6 节插表第 29。

10 该边区核心区域计有：豫南的潢川、罗山、固始、商城、光山、新县等 6 县；鄂东的麻城、罗田、英山、广济、黄梅、浠水、蕲春等 7 县；皖西的六安、霍山、岳西、太湖、潜山、金寨、霍邱等县。

11 参见《抗日战史·南昌会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正文第 6 页后，第四篇第十五章第一节插表第二其二（图表页无页码）。

12 据军令部《第十八次陆军战斗序列表》（1939 年 1 月 30 日），转引自《抗日战史·南昌会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正文第 6 页后，第四篇第十五章第一节插表第二其一。

13 以上均参见《第九战区游击部队兵力地区表》（1938 年 12 月 17 日），见《抗日战史·南昌会战（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第 20 页后，第十五章第三节插表第七。

14 参见《抗日战史·第一次长沙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第 4-5 页；第 8 页后，第四篇第十七章第一节插图第一。

15 《军委会之亥俭电》（1944 年 12 月 28 日），转引自《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机密日记》，1945 年 1 月 1 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年，第 1940、1941 页。

16 参见《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机密日记》1945 年 1 月 1 日、15 日、25 日等。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年，第 1940-1942 页。

17 本段除另注之外，还参考了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年，第 218-223 页；黎民兴等：《第十战区纪念册》，蚌埠：第十战区政治部印行，1946 年，第 83-96 页；《抗日战史·豫西鄂北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第 6-7、123 页。

18 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 年，第 218 页；《抗日战史·豫西鄂北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 年，第 123 页。

19 例如大别山，既是国民党第 21 集团军的根据地，也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根据地。国民党军在大别山的东北，新四军在大别山的西南，国、共根据地面积比大约是 3:1。